

高昌偃氏家族与儒学

刘嘉伟

摘要 高昌偃氏家族在元代从西域入居中土,浸润于中华文化,入华后第五代偃逊在元末避乱入高丽,偃斯出仕明朝,家族享受尊荣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史所罕有。偃氏族人以“忠”“贞”“孝”等“三节”称名当时,尽忠报国,孝悌传家,诗文充溢王道思想;族人联翩登第,为政以德,广受赞誉;畏兀儿富有语言才能,偃斯、偃长寿博通诸语,推动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外交,卓有贡献,偃长寿还提出了多国联手抗倭的主张,培养翻译人才,将儒学及汉、蒙古、畏兀儿等多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了海外。偃氏族人服膺理学,多能诗书,他们的文学、艺术贡献也为“中华文学”“中华美学”增添了新的光彩。

关键词 偃氏家族;元代文学;中华文学;儒学;元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9;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4-0078-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7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ZD124)

放眼中国甚至世界,在古代史上中国高昌偃氏家族特色独具。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怛俚伽普华、岳璘帖穆尔兄弟望风而附,两兄弟家族从西域高昌迁居中土,此为入华第一代。从岳璘之孙偃文质开始,以“偃”为姓,以志家族起源之偃辇河(今色楞格河)。《新元史》称:“畏吾氏,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又做伟兀,又做卫兀……凡世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1](P121)据此可知,从民族划分来看,该家族是畏兀儿,在元代属色目人的一支。族人以“忠”“贞”“孝”等“三节”称名于时;子孙又联翩登第,时人以“六桂”誉之。元末战乱,该家族入华后的第五代偃逊举家东迁至朝鲜半岛,其弟偃斯入仕明朝,子孙绵延至今。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论及此家族时说:“能以儒术致通显若此,不可谓非色目人之特色也。”^[2](P34)

关于偃氏家族,陈垣先生以降,杨镰、萧启庆、杨绍固等诸位先生多有论说,该家族的世系与流衍已梳理清楚。偃逊的《近思斋逸稿》湮没于韩国,近几年才公之于众,不少问题值得细化探讨。我们可以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基础上,将论阈扩展到入明及入高丽(朝鲜)的偃氏族人。该家族服膺儒学的情况,除史学外,也可以从文学、哲学的维度加以探析。我们有必要梳理元代偃氏家族服膺儒学的情况,揭橥其特色。《论语·先进篇》记载了孔子对于及门诸弟的评价:“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常被称为“孔门四科”。我们可以从此“四科”入手,探讨偃氏家族服膺儒学的状况,希望能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研究及儒学史、域外儒学传播研究添砖加瓦。

一、德行:精忠报国,孝悌传家

《周易·节》的《象传》说:“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德行”,即道德品行的素质。偃氏家族受到儒家礼乐文明熏染,文质彬彬。据元人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该家族入华第一代岳璘帖穆尔

即能授以儿子中原儒书。第二代合刺普华在平定私贩万人作乱之战中，英勇不屈，以身殉国，前文所述“三节”之“忠”，即言此事。

合刺普华牺牲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为元代前期之事。殆及蒙元政权定鼎中原，社会趋于稳定，偃氏家族成员道德情感之“忠”，便表现为坚定的“王道信仰”。儒家学说把上古三代看作是道德最完备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是王道社会，其与权谋武力所建构的霸道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元代的疆土最为辽阔，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此时最有可能在最广阔的范围内致君尧舜，教化四方。这样的观念在偃氏家族成员现存的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如该家族入华后第四代偃玉立为官山西，祈雨天圣宫时，作诗道：“琼枝珠蕊垂甘露，愿祝丰年瑞雪颁。”^[13](P336)偃玉立的侄子偃逊存诗更多。他的《己卯岁试笔》其一：“但愿秋来好禾稻，拟书大有答吾皇”；其二：“始信野人无宠辱，还知天子布阳和。”^[14](P3)新春的寄语与祝福，满是忠君恋阙之心。其《赠自然道者》开篇“自然道者神仙侣，偶向尘寰学扁卢。”^[14](P6)刚赞扬对方神仙一流的人物后，笔锋一转：“每以活人为己任，漫将医国许吾徒。”^[14](P6)从道医的“医人”想到了“医国”。从一般的认知来看，道者，应当是云水飘飘，自在逍遥，而偃逊却马上联想到了“医国”，可见“大有为于天下”的情怀已深深植入其潜意识中。即使元末战乱之际，偃逊《岸上行江阴途中》犹言：“安得排云扫氛侵，致身稷契君虞唐。”^[14](P3)一如老杜般，但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元明之际的王逢《寄偃正字》称：“圣王经贯道，家世桂名坊。”^[14](P246)这是投赠偃逊之诗，说明偃氏家族久膺儒学。偃氏族人的儒学信仰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国难当头之时，能够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偃列箴，字世德，文质第五子，至顺元年(1330)进士，至正中历官朝阳县达鲁花赤，改河南路经历。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五所载：“元末红巾攻府城，偃列箴守北门城且陷投井死，妻子从殉者十一人。”普颜不花，字希古。至正五年(1345)右榜状元。明兵压境，普颜不花据城力战。《元史》卷一百九十六本传记载了他捐躯前的慷慨言辞：“‘我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不屈，死之。”普氏与偃氏同根同源，都是高昌贵族克直普尔的后裔，普颜不花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存于《溧阳沙涨里普氏家乘》。普氏遗书称：“尔还里后，明兵日逼，人无固志，地罕坚城，万无完理。尔父幼读圣贤书，常佩孔孟取义成仁之训，兼受国家厚恩，义不偷生，尔母素怀烈性，誓与我偕存亡，但愿太夫人得脱于难，则我两人含笑地下矣。”^[15]文字凄恻感人，其忠孝溢于言表，而且表明自己是服膺孔孟之道才舍生忘死。偃列箴、普颜不花都效法了他们同族先祖合刺普华的义烈之举，以身殉国，践行了儒家“忠”的道德品质。

元明之际，偃氏族入出处各有不同。偃斯在元末曾任昆山、嘉定知州，后入仕明朝。杨绍固等的辑佚论文中还收录了偃斯《祭忠烈公文》，祭祀的传主就是前文所论普颜不花，偃、普二人是同族堂兄弟。偃斯对于普颜不花“忠”的精神品质由衷赞赏。文中称“前元”“我太祖皇帝”，应是入明后所作。对于贰臣复杂心态与历史贡献的研究，学界已不乏其人，但研究视域多集中在宋元、明清易代之际。元明易代之际，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西域人，偃斯内心作何感受，文献不征，我们很难给出精准的判断。但通过这篇祭文，还是可以感受到偃斯内心的矛盾。偃斯祭祀为元王朝尽忠而死的臣子，虽然被祭祀者得到过朱元璋肯定，但在明初政治高压下，祭祀行为是充满风险的。偃斯这样做了，而且在祭文中不惜赘语，可见其内心深处对于元朝的情感，也证明了我们所论说的偃氏家族受儒家“忠”文化濡染之深刻。

蒙古、色目部族本有文化也讲求“忠”，但偃玉立、偃逊诗歌中的“忠”，从表达方式看，明显是受到儒家王道思想的影响。至于“孝”，也是世界上多个国家、民族遵循的道德理念。如何判定偃氏家族之孝源于儒家思想呢？元史专家札奇斯钦认为：“蒙古的伦理观念，父子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是注重自然情感的；按汉地的伦理观念，则父子关系是以礼为基础，是偏重礼仪的。”^[6](P1)偃家“三节”风操之一的偃文质割肉事亲。在中华文化中，割肉疗亲的事例很多，这种行为，有正史记载，并被政府嘉奖的，大概最早是唐人王友贞。到了宋代，此风愈炽。理学家真德秀说过：“(割股事亲的行为)虽非圣经所尚，然其孝心诚切，实有可嘉。”^[7](P116)大儒朱熹亦言：“人皆知君父之当事，我能尽忠尽孝，天下莫不以为当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亲，其事虽不中节，其心发之甚善，人皆以为美。”^[8](P1043)由于种种原因，

现当代学者对于这种行为多持否定态度。如果抛开科学与迷信、野蛮与文明之分殊不谈,宋儒持论还是相对公允的。真德秀指出了儒家原典无相关记载,又肯定了孝心可嘉;朱熹是从儒学思想家国同构、孝忠同构的维度出发,也指出了行为本身虽过激,但动机值得肯定。殆及元代,风衰俗变,很多基本的道德秩序受到冲击,西域人偃文质却如此孝亲,自然得到了儒者的交口称赞。和宋儒朱熹、真德秀一样,儒者赞赏的是偃文质孝心可嘉。

偃哲笃为文质之子,系该家族入华后第四代,在元人孔齐《至正直记》中,称寓居溧阳(今属江苏)的偃哲笃为“色日本族之首”。《至正直记》记载了偃家子侄的孝亲表现:昏定晨省,济济有序,没有父母之命,不敢擅自入卧寝,这些完全是中原礼乐文明的熏陶浸染。对此,孔齐称“深羡慕之”,并以此作为自己治家的榜样。《至正直记》卷四还有《文益弃母》一则笔记,记述溧阳王文益入国子监,母死不即奔丧,经偃哲笃劝说以归。这些材料进一步印证了偃氏家族善于教导子侄,其“孝”并非游牧民族自然感情之流露,而是深受儒家礼乐文明的熏陶。偃氏家族的孝行代代相传,偃哲笃长子偃逊还写过《郑母诗》:“我闻郑氏母,孝节自孩提。刲肱疗其亲,誓死从所归。事姑力既竭,相夫礼无违。”^[4](P21)西域人对于中原女性孝节的积极肯定,这也可以说是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政事:科考入仕,广行仁政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先言“政事:冉有、季路”,后言“文学:子游、子夏”。所述“四科”顺序与今本《论语》稍异。清人刘宝楠谓《仲尼弟子列传》说,“先政事于言语,当出古论。”^[9](P441)我们的论说,不妨先从“政事”展开。

所谓政事,也就是政府的事务。该家族入华的前两代即以军功起家,参与了蒙元政权的初期建设。萧启庆先生曾列表展现“偃氏历代入仕途径”,可以清晰地看到偃氏家族入仕方式的转变,到了入华第四代,从军功、承荫等入仕方式到6人皆以科举入仕,即为偃氏“六桂”,到了第五代,由宿卫入仕1人,承荫2人,科第4人,还有偃理台、偃斯、偃赉、偃弼等人曾入国子学研习,并以此步入仕途^[10](P719)。元朝吏治,出身最重“根脚”,由承荫入仕的选官制度也导致不少蒙古、色目贵胄子弟对于汉文化漠不关心。元中期恢复科举,偃氏家族紧紧抓住这一入仕机会,科考连捷,如元代名流许有壬《合刺普华公墓志铭》所言,“儒家世科,未有如偃氏一门兄弟之盛,天下传为美谈”。这也是偃氏家族子弟长期服膺汉文化使然。

偃氏家族现存留文献虽不多,但与科举有关者却为数不少。偃逊的别集《近思斋逸稿》孤本,今藏于韩国庆州,笔者仔细翻阅,发现其送别诗多涉及科考,如《送人人京师二章》《江水浑二章章六句送徐秀才游淮南》《惜别行赠陈彦宾》《送赵克让归河南应举诗七首》等几首诗都有盼对方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偃逊《崇天门下发榜口号》,还生动地记载了元代科举发榜时的情景。元代科举时续时断,描写科考情景的诗作并不甚多,况出自诗集久佚的西域色目人之手,更应珍视。诗中“传牒”“传丹诏”书写以及禁苑金水河、东华门等地点的描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文献材料。如果从儒家“事功”维度考量,由科考入仕,以文易武,对于从政者的文化态度、行为方式,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官员类型可以大致分为几种:文官、武将、外戚、宦官。一般来说,科考入仕的文官发政施令,政治上相对清明。偃氏家族入华后的第二代合刺普华就曾上书言道:“亲肺腑,礼大臣,以存国家之体;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士”^[11](P595),可见其政治韬略。元政权以武起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励名兴学的政治主张,更是难能可贵。可惜彼时战乱未平,合刺普华为国捐躯。由于中原文化的濡染,科举考试的历练,从合刺普华之子偃文质开始,也就是偃氏族入华第三代起,基本上是担任文职官员,且在任上推广教化、多有惠政,令各族士大夫交口称赞。大儒邓文原《广德路修建庙学记》称:“侯名大贤(偃文质),字仲彬,高昌人,家以忠贞著,故名堂曰‘三节’。其至不期月,而庙学悉隆旧规。又为造祭器,缮官署,筑舍以训蒙,完廩以膳士。为政可谓知本矣。”^[12](P60)该文从儒学发展、儒学实践等多个角度高度赞赏了偃文质修建庙学的义举,言“此学圣贤之事,而非非常才所能”,高度评价了偃

文质的教化之功,肯定其“为政知本”。邓氏还特地强调了文质的西域高昌人身份与“三节”家世。作为汉儒,文原乐于见到西域人为官一方,教化百姓,以仁兴邦。

文质之子偃玉立、偃哲笃兄弟多有德政,获得士庶拥戴。哲笃长子偃逊《过故宋丘太师宅题种德堂》:“政化只今谁第一,上书先奏德星临。”^[14](P4)诗题中的“种德堂”本身就深具儒家教化意味,并直接以“政化”二字入诗。至正十八年(1358),偃逊举家避乱东迁高丽,被封为高昌伯,改封富原侯。其子长寿、庆寿、眉寿,孙偃循皆出身科举,为官后亦多为推广教化。偃逊之弟偃斯为政以德,元人殷奎《送昆山偃使君迁守嘉定序》亦盛赞其治下“风淳俗美,而上下相安也”。谢应芳《贺偃知府到任启》更是对其到任嘉定欢欣鼓舞,不吝赞辞。到了明代,偃斯又被朱明王朝所任用,做过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深受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浸润,却身事二主,偃斯的内心也有矛盾痛苦,前文已经谈到。在朱元璋存留的诏书中,笔者找到了《召山西左参政偃斯职吏部尚书》:“保身固位,无补于君者,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于朕,已有年矣。于事未见刚明,迩来露其过。若欲究之,虑恐可惜。特赦尔过,取任吏部尚书,驰驿前来,毋稽。故兹敕谕。”^[13](P123)文字虽不多,但可以读到雄猜之主的驭人之道:稍微给两句肯定,几乎都是命令、否定、威胁、猜忌的语气,读之令人不寒而栗。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偃斯能够依旧践履儒家事功,有用于社稷,更印证其深深浸润于儒家文化之中。至于其在明代的外交贡献,详于下文。

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入华后的第四代开始,偃氏家族的入仕方式主要通过科举。熟读儒家经典,使得偃氏子孙在各自任上,尽力施行仁政、推广教化。元祚易鼎,偃逊、偃斯兄弟,一东入高丽、一出仕明朝,仍然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

三、言语:博通诸语,建功外交

公元13世纪初建“大蒙古国”时,蒙古人只有言语,无有文字。成吉思汗西征,俘获畏兀文士塔塔统阿,其人“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铁木真“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4](P3048)于是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从欧阳玄的家传来看,偃氏祖先颇具语言天赋和语言教授传播的才能:“岳璘精伟兀书,慷慨以功名自许,赏算悉以畀兄子,身无私焉。年十五,以质子从太祖征讨,多战功。皇弟幹真奏求师傅,上命公。公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杀为第一义。上闻嘉之,中原诸路悉命统治。”^[11](P590)很清晰地记载了岳璘帖穆尔就是以精通伟兀书(畏兀儿文)而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信任,而他所讲的“孝弟敦睦、仁厚不杀”等,多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说明其在大蒙古国时代,就已经用畏兀儿文拼写的蒙古语向黄金家族统治者传播儒家文化的仁政理念了,这应当是蒙元初期多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注意的篇章。

岳璘是偃氏家族入华后的第一代,到了第五、第六代,元亡明兴,偃氏家族在新建立的明王朝与海外朝鲜半岛遥相辉映,以多种语言的掌握,外交辞令的精通和政治大局的把握,游走于中朝两国外交舞台上,屡建功勋。“孔门四科”中的“言语”多指外交辞令,偃氏家族的外交贡献,我们可以在这一部分探讨。

朱明王朝建政之时,遁于漠北的“北元”政权还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而高丽曾是元帝国的藩属国;明王朝、北元、高丽三者的国际政治关系十分微妙。朱元璋取代元王朝建立新政权,在外交上,自然要积极争取邻国的支持以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朱元璋便派遣偃斯出使高丽,通知高丽当局放弃与元政权的政治往来,承认明王朝。洪武二年(1369)八月,偃斯归国不久,明廷再次派遣其出使高丽,明确了两国间的宗藩关系。朱氏好猜忌,对待臣子威多恩少,尤其不信任色目人和前朝臣子,却对西域人偃斯青眼有加,偃氏的政治能力、外交手段、言语辞令都应该是被综合考量的因素。此外,朱元璋“知逊、长寿父子有声于其国,使其宗人偃斯来”^[15](P354)。

高丽、朝鲜王朝也先后派出偃逊之子偃长寿等人次数出访明朝。朝鲜史料称长寿“自事皇明,朝京师者八,屡蒙嘉奖”^[16](P151)。这八次出使,前后历时近30年,经历过高丽、朝鲜王朝的政治巨变。最后一次出使,朱元璋刚刚去世,建文帝即位。两国的政治风云变幻,明太祖的喜怒无常,给东亚外交带来了

很多变数, 偃长寿作为小国使者, 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外交危机。除政治智慧与韬略外, 最主要得益于其语言优势。如高丽辛禔十三年(明洪武二十年, 1387), 其人出使明朝, 朱元璋曾亲口对他说: “先番(指高丽, 笔者注)几个通事小厮每来, 那里说得明白! 你却是故家子孙, 不比别个来的宰相每, 你的言语我知道, 我的言语你知道。以此说与你, 你把我这意思与管事宰相每说, 大概则要至诚, 倒不要许多小计量。”^[17](P470)从洪武皇帝的话语来看, 他把父祖久居中土的偃长寿当作“故家子孙”, 完全没有介意其畏兀人的民族身份, 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甚至国家的界限。

《高丽史》卷一百三十六《辛禔传四》载: “长寿服帝所赐纱帽、团领而来, 国人始知冠服之制。”对此, 高丽名儒权近曾赋诗说: “万里朝天使, 三韩许国臣。从容陈下志, 密勿近严宸。雨露恩荣合, 衣冠制度新。海邦何陋直, 一是被同仁。”^[18](P51)盛赞了友人偃长寿的外交功绩, 突出了他的言语之才与衣冠制度使得三韩之地一体同仁之功。《论语·宪问篇》云: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把衣冠服饰作为礼乐教化的一部分。在偃长寿的提请努力下, 朝鲜王朝遵用明制, 甚至明亡清兴后, 朝鲜国内尚坚持前朝衣冠; 而在明初, 向朝鲜半岛传达“冠服之制”的是西域高昌人的后裔, 这也可以说是一道历史奇观。辛禔十四年(1388), 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 建立了朝鲜王朝。在外交方面, 朱元璋明确要求朝鲜: “你那里使臣再来时, 汉儿话省的著他来, 一发不省的不要来。”^[16](P140)又是偃长寿不辱使命, 朝鲜太祖五年(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十一月, 其人出使明朝。此次外交晤谈中, 多疑的明太祖谈到李成桂对明廷缺乏诚意, 长寿极力为之辩解称: “臣到高丽, 今四十年, 恭愍王不必说了。中间两三介王, 臣不敢保其至诚, 如今王一心敬上, 不敢怠慢。”^[16](P143)再次展现语言才能博得朱明王朝的信任。据统计, 偃氏家族成员出使明朝共达20余次之多^[19]。限于篇幅, 不再一一展开。

偃长寿在对外关系上的贡献, 不仅是多次出使明朝, 还提出过抗倭主张。他曾向高丽王上了一篇《御倭奏疏》, 提请借鉴明太祖的做法, 广筑城、多积粮。同时结合倭寇的入侵特点, 提出多造船。还提出了严号令, 理分工, 递烽燧, 互救援等具体措施。偃氏御倭的贡献, 杨绍固《论明初偃氏家族的御倭贡献》一文论述颇详, 读者可以参看。偃氏御倭建议虽未获朝鲜君主采纳, 但仍可见一个人朝高昌人内政外交的韬略及其对于中国政事的借鉴。这也可以说是开启东亚多民族、多国家想方设法联手抗倭之先声。

在朝鲜半岛, 偃氏族人的语言天赋不仅仅建功于外交领域, 还表现在翻译才能。朝鲜王朝成立后, 置司译院, 偃长寿被委任为提调官。朝鲜太祖三年(1394)十一月, 长寿曾上书太祖李成桂, 筹划译院建设与生徒培养事, 言辞恳切, 措施具体。司译院虽然主要教授汉语, 但同时教授蒙文、伟兀字, 培养通译人才。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载: “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 除重名外, 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他所说的畏吾儿字, 即伟兀字, 应该是西域人所使用的古回鹘文。同时精通汉、朝、蒙、伟兀等多种语言, 大概只有具备跨国界、跨民族多元文化背景的偃氏族人能堪此任。孔门的“言语”科才干主要作用于外交辞令, 而偃长寿的言语才能, 除了外交还作用于培养翻译人才。同时, 作为高昌文儒, 长寿还利用自己的言语之才, 传播儒家文化理念。作为司译院提调官, 在翻译实践和教材编写上, 偃长寿也颇有建树。据朝鲜史料所载:

我国自三韩至于高丽, 世世事大, 设司专习华语。至国初置司译院, 学徒所读不过《老乞大》《朴通事》, 前后汉等书而已。且其书所载, 率皆俚近俗语。学者患之。判三司事偃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 名曰“直解”, 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 唯以“直解”一部为习。长寿之功, 至此大矣。而况中朝儒者见“直解”, 皆以为解说至当, 敬慕不已, 则长寿之人可知矣。^[16](P421-422)

这段文字为李朝上护军闵光美等60人上书所言, 记录在朝鲜《世宗实录》之中。连用了几个具有感叹语气色彩的句子, 评价不可谓不高。所谓“小学”, 在古代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也主要是为了阐释

儒家经典服务的。今天看来,偃长寿是优秀的外交官、编译局领导,还是优秀的翻译家、翻译教育家,融“孔门四科”之“言语”和“文学”于一身。元中期的馆阁大老虞集说过:“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20](P1068)作为古高昌国的后裔,偃长寿具备祖上擅长语言文字的优势,并将自身所具备的畏兀儿语才能连同汉语汉文化一起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迹。长寿之子偃耐在儒门“言语”一科上,亦有乃父之风,其人曾任判司译院事。长寿之侄偃循朝鲜太宗八年(1408)文科考试及第,曾掌编《三纲行实》,又进《孝行录》《资治通鉴训义》等。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到是将中国儒学、史学等思想文化翻译推广到了朝鲜。

四、文学:服膺理学,艺文兼擅

“孔门四科”所言“文学”是大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狭义的文学学科(literature),而是指《诗》《书》《易》等文献及学术,也包括作为艺术言说的文学。

就狭义的文学来讲,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7册收录了偃玉立诗16首,偃哲笃诗3首,《全元诗》第59册收录偃逊诗120首;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1册收录偃哲笃文1篇,第36册收录偃文质文1篇,第38册收偃处约文1篇,第39册收录偃玉立文4篇;唐圭璋编《全元词》收入偃玉立词1阙。偃氏族人的艺术才能,依现存文献来看,偃玉立书法碑刻真迹较多,泉州清源山至今仍留有其“南泉佛国”“玉立”等榜书大字与《九日山西峰》《瑞像岩》等诗刻,清人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言其书法“落墨古朴,尚能自见骨力”。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十二还著录:“石溪禅寺《无一禅师塔铭》,偃文质撰,偃玉立正书,后至元三年三月(安徽广德)。”碑文内容《全元文》有所收录,书法是偃玉立书丹,父子合作,这也是偃氏家族华化进程中的一段佳话。偃哲笃诗歌《题商德符李遵道共画竹树》,见于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四;《题赵千里夜潮图卷》见于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四。皆存于艺术文献,说明哲笃有较高的绘画艺术修养。

孔门之“文学”还涵盖有今天“学术”概念的意义。论及元人学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理学。理学在元代成为官学,元代科考以理学家的著述为标准,而偃氏家族屡胜科场,自是深谙理学。现存文本中,通过偃玉立《止堂诗》序可以探讨其理学修养:

余去朝之二年,禄余不给于食,益厌城市。濂阳村求田数亩,结庐以居,遂得躬耕焉。扁兹堂曰“止堂”,为之铭,复系以诗。抑亦见安于义命云耳。^[31](P332)

玉立名其居所曰“止堂”,从堂号可以窥探其文化底蕴、思想情感、性情襟抱,我们不妨认真解读一番。“止”这个概念范畴,儒释道三家的经典都曾经出现过,如《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梵语“奢摩他”(Samatha)在佛教典籍中常被翻译成“止”,为禅定之异名。到了偃玉立,已是偃氏家族入华后的第四代,其人儒释道文化兼有涉及,但从下文的“安于义命”四字分析,应该是受到了理学的深刻影响。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较之传统儒学,理学家更重视哲学思辨,如《周易程氏传》中解读乾卦时,就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在元代,文道合一,理学昌明,元中期的虞集说:“事变之来,视乎义命而安之,则忧患利泽,举无足以动其心,则其为言也,舒迟而澹泊,闾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贵之。”^[20](P571)这是典型的理学文论。偃玉立所谓“安于义命”,和虞集“视乎义命而安之”如出一辙。后人论元诗,虞集位列“元诗四大家”之首,他的诗歌成就是否为元人魁首,见仁见智,但其在元代尤其是中期诗坛影响力最大,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曾撰文论说其以文坛宗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主持风气、培育人才、奖掖后学,带动着非汉族士人向风趋雅^[21]。虞集和偃玉立的弟弟偃哲笃有所交往,虞氏《道园遗稿》卷三存有《和偃世南除西台御史》。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玉立受到了虞集的影响,不过其为人文受到元代理学思潮影响,受虞集等鸿儒的文学思想浸润,是可以肯定的。翻检宋代理学家的言论,不少语录将“止”与安于义命之意联系在一起。如《周易》艮卦的彖传曰:“艮,止也。”《周易程氏传》解释说: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22](P968)

程颐所说的“止”,主要是指忘我无我,清心寡欲,才能定心、定性。其理论本身汲取了《道德经》“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及佛家“熄灭贪嗔痴”等理念。《河南程氏遗书》还记载过二程的言论:“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见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之心如止水。”以“止水”喻心,偏重的也是人格修养与身心调适。此外,宋代大理学家张载说过:“《易》大抵以艮为止,止乃光明。故《大学》定而至于能虑,人心多则无由光明。”^[23](P174-175)“止”也是与定心联系在一起。

经过上文对于宋元理学家言论的比对分析,偃玉立所谓“止堂”,主要是汲取了中华文化中理学思想的营养。居室是一个人常年居住出入之所,其命名很能体现主人的襟抱。偃氏《止堂诗》以“于焉遂栖止,终焉以逍遥”结尾^[3](P332),可见这位高昌才子在借理学思想康泰身心,在日用常行中修养君子人格,行于义、安于命,一心止水常平湛,万事浮云任往还,能够任运逍遥、快意人生。这也可以说是西域人士汲取了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偃氏家族入华后的第五代偃逊在写给胞弟的诗《金陵将归寄舍弟燠其二》中说“儒术吾家事”^[4](P16),可见这个高昌家族已经自觉融入中华文化序列之中,世代业儒。偃逊诗中,还以“闲儒”自居,以“腐儒”“鄙儒”自嘲。受儒家文化影响,偃氏族人为文言辞春容,霏如春风。清人严观所辑《江宁金石记》卷七载:“正议大夫中书工部尚书高昌偃哲笃撰,……辞闲整,歌亦典雅。在元文中堪与晋卿、道传并驾。”^[24]所举晋卿、道传,为元儒黄溥、柳贯,同列于元代“儒林四杰”之中。偃哲笃闲整、典雅的文风,显然是儒家文化影响下涵醇茹和的结果。偃玉立为哲笃之兄,《秘书监志》卷八存其《皇太子笺文》《正旦贺表》,由于是台阁文字,更为俯仰雍容。儒家文化作用下,偃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多具中和温润之美,前文所引偃氏诗文多可证之,此不赘。

中国古代诗作常常透露出作者的文学思想,偃逊也是如此。如其《赋得凤凰台与笃敬夫御史》云:“文光烛九垓,音与箫韶侔。”^[4](P21)文光能烛照九垓,这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脉相承,是典型的儒家文论。偃逊如此评价笃列图(字敬夫)的文章价值,具有如是文学思想,说明其受儒家文化浸润之深。“箫韶”反映的是儒家礼乐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如是总结音乐的政治功用:“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在儒家文艺思想理念中,制礼作乐,可以通达上天,教化万民。偃氏显然秉持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偃逊另一首诗《送别汪伯羽兄弟归临川》写道“文章绚光绮”,也是对于文学社会价值的肯定。

儒字的右半部分从“需”,《周易·需》彖传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刚健有为、气有浩然,也是儒家推崇的美学精神。偃玉立《吉州道中三首》其三:“涧壑昂藏郁翠松,半空清响伯夷风。顽廉儒立知谁听,夜雪深关骤玉骢。”^[3](P336)“顽廉儒立”的典故,出自《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程千帆先生指出:“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语言的反复使用,自然有不少可供后来者比拟、借鉴、沿袭、继承的故事、成语产生与流传。这也就是所谓典或典故。文士们在作品中用典,是要让读者更方便、更丰富、更深刻、更准确地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25](P382)玉立的使事用典即是如此,他准确地运用了伯夷的事典与《孟子》的语典,表达作者高洁的心灵,也说明其深深地融入中华文化,能够娴熟运用儒家语码传达自己的情感,使得诗歌气格轩翥,具有刚健之美。如果从偃氏高昌远祖民族性格的角度分析,这也与耿介的西域人推重阳刚的审美理想相表里。元代诗歌,经典

化程度不高,后人多以纤秣繁缛称之。偃氏族人融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于一炉,为诗坛增添了亮色。

五、结语

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元代历史、文化与文学都产生了若干新的变化。蒙古统治者避虚务实,不尚玄言,但也知晓儒术握持纲常、倡言王道而有助于维护统治,所以元代儒学重视实际,笃于践行。具体到偃氏家族,他们笃信儒家学说,忠孝传家,为政以德,身体力行地实践儒学政治理念。偃文质、偃玉立、偃哲笃、偃斯这三代族人为政一方,都以兴学兴教的善举广受赞颂。偃逊及其子孙还把儒学远播高丽,惠泽深远,这在儒学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颂的一笔。畏兀儿人富有语言天赋,偃斯、偃长寿等人利用自己博通诸语的优势在明初推动中国与高丽、朝鲜外交,卓有贡献。偃氏家族诗礼传家,族人服膺理学,多能诗书,享誉文坛。要之,对于偃氏族人践行“孔门四科”问题的梳理,证实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证实了各民族对于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均有贡献。

著名学者刘跃进先生指出:“民族文学问题,现在越来越引人注目。……201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时代作用。”^[26]他提到的“中华文学”,不仅是“汉文学”,而是涵括了多民族作家文学与多语种民间文学的。纵观中华文学史,元代疆域最为辽阔,蒙古、色目等多民族文士浸润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之中,彬彬称盛,发而为文、争奇竞秀,这是新异的历史现象。元代雍古部马祖常、回回人萨都刺、葛逻禄氏迺贤、蒙古伯牙吾台部泰不华、唐兀氏余阙、蕤林金哈刺皆称名文坛,留有文集。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孙未见经邦济国的儒者政绩,亦未有文学作品传世。且朱明王朝建政后,蒙古、色目士子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政治环境,多风流云散。相形之下,我们所探讨的高昌偃氏家族扬风扞雅,瓜瓞绵绵,尤为值得关注。偃氏族人的文化与文学成就证实了儒学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思维水平等得以提高,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财富。其文学实绩为“中华文学史”增添了光彩,其中的教益,也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加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顺利实施,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柯劭忞. 新元史.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 [2]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 全元诗: 第37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4] 全元诗: 第59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5] 杨绍固, 李中耀. 《全元文》佚文二十八篇辑考——元代高昌籍偃氏、廉氏家族相关佚文辑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2, (2).
- [6] 札奇斯钦. 蒙古史论丛: 上册.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0.
- [7] 真德秀. 真西山先生集//丛书集成初编: 第2400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朱子语类: 第4册. 武汉: 崇文书局, 2018.
- [9] 刘宝楠. 论语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0] 萧启庆. 内北国而外中国: 蒙元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1] 欧阳玄. 高昌偃氏家传//全元文: 第34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12] 全元文: 第21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 [13] 明太祖集. 合肥: 黄山书社, 1991.
- [14] 元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5] 屠寄. 蒙兀儿史记.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16]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7] 郑麟趾. 高丽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162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18] 权近. 阳村集//民族文化推进会. 韩国文集丛刊: 第7册. 首尔: 韩国景仁文化社, 1990.
- [19] 叶泉宏. 偃氏家族与丽末鲜初之中韩关系. 韩国学报, 1993, (12).
- [20] 虞集全集. 王颀点校.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 [21] 刘嘉伟, 程前. 文坛宗主虞集与元代非汉族士人的向风趋雅. 文艺评论, 2016, (2).
- [22] 程颢, 程颐. 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3] 朱熹, 吕祖谦. 近思录. 查洪德注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 [24] 严观. 江宁金石记. 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
- [25] 程千帆全集: 第11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6] 刘跃进. 中国文学研究40年思潮.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

Gaochang Xie Family and Confucianism

Liu Jiawei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aochang Xie Family moved into mainland-China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Yuan dynasty and was infiltrated by Chinese culture. After entering China,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Xiexun went to Korea at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to escape from chaos. Xiesi became an official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family enjoyed honor for a long time with a wide range of radiation, which is rare in history. The Xie family was famous for the "three virtues", namely, loyalty, chastity and filial piety. At that time, they were loyal to the country, filial piety and family heirs, and their poems were full of kingly thoughts. Family members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ne after another, and were widely praised for their political ethics. Uyghur people are rich in language abilities. By making use of their language advantages, Xiesi and Xiechangshou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diplomacy of China and Korea in Ming dynasty. Xiechangshou als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trained translation talents, and spread Confucianism, Han, Mongolia, Uyghu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verseas. The Xie People'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ributions have also added new luster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esthetics".

Key words Xie family; literature of Yuan dynasty; Chinese literature; Confucianism; culture of Yuan dynasty

■ 收稿日期 2022-02-06

■ 作者简介 刘嘉伟, 文学博士,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徐州 221116。

■ 责任编辑 何坤翁